



1948年獲派香港工作 1955年開始寫作新派武俠小說 金庸人生兩大契機都發生在大公報

數十年來，凡有華人處，無不讀金庸。「飛雪連天射白鹿，笑書神俠倚碧鴛。」這位文壇巨匠以磅礴的才情、生花的妙筆、深厚雋永的家國情懷，寫下十五部洋洋大作，編織了一個刀光劍影、兒女情長、快意恩仇的武俠江湖，承載了幾代華人的共同回憶。而當年從一介書生化身「武俠小說宗師」、並由此奠定其一生事業之根基，正是在《大公報》這塊「福地」上。金庸曾深情回顧道，自己人生的兩次重大契機，都發生在《大公報》，「我在《大公報》，貢獻過自己的青春歲月和聰明才智，今天回頭來看，我可以覺得今生無愧。」

值此金庸誕辰百年之際，重溫這位文化大家與百年大報之間淵遠綿長的一段情緣，以此緬懷先生愛國愛港的高尚品德，追憶「大俠」至情至性的人格魅力。

大公報記者 鄭曼玲



二〇〇九年四月，金庸重回大公報報館，觀看大公報報史展。

原名查良鏞的金庸生於一九二四年三月，浙江海寧人。一九四四年查良鏞考入重慶國立政治大學外文系，後轉入蘇州東吳大學（今蘇州大學）學習國際法。

應聘《大公報》脫穎而出

一九四七年，《大公報》上海館公開招聘三名翻譯，並在應徵者中擇其優秀者十人參加筆試，當日試題是：電報一份，社論一篇，譯成中文。查良鏞僅用時六十五分鐘就率先交卷。隨後，他又順利通過口試，在眾多應聘者中脫穎而出，第一個被錄用。

這是查良鏞生命中一個重要的轉折點。至此，他邁進了自學生時代就很嚮往的《大公報》的大門。

一九四八年三月，《大公報》香港版復刊。出於業務需要，想從上海館調派一名翻譯赴港。查良鏞清楚記得，原定調赴香港的這位同事姓李，當時剛剛新婚燕爾，不願勞燕分飛，這個「苦差事」只好讓查良鏞代勞。

多年以後，再度回想，這一次工作變遷，看似偶然，實則命定。查良鏞不禁感嘆命運的神奇，他說：「就差這麼一點，可能就來不了香港，人生的命運可能就會完全不同。」

任職《大公報》香港館的查良鏞，先後做過記者、翻譯和編輯。《大公報》創辦《新晚報》後，查良鏞又任《新晚報》副刊編輯。

當時他已常常動筆寫作，並為此起了「林歡」「姚馥蘭」等筆名。他說，「姚馥蘭」就是英文Your Friend（你的朋友）的諧音，因當時副刊男性色彩偏重，他想以一個女性味道十足的名字來寫影評，沖淡一下。

從一介書生走向「武俠小說宗師」

與查良鏞同在《新晚報》任職的還有一位陳文統，即後來武俠小說界鼎鼎有名的「梁羽生」。二人志同道合，同樣愛好琴棋書畫。工作之餘，兩人經常把民國以來的武俠小說作為談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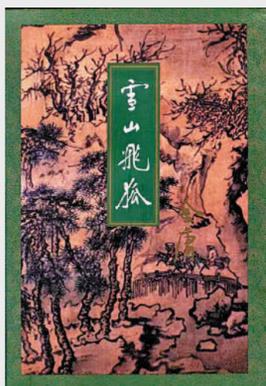
一九五四年，香港武術界的太極與白鶴兩大門派因於門戶之見而發生爭執，掌門人決定在澳門比武打擂，一決雌雄。想不到香港竟有數萬人乘船過海，日夜觀戰，盛況空前。香港各報都予以大幅報道，風行一時。

《新晚報》由此獲得啟發，先由陳文統以筆名「梁羽生」，寫作武俠小說《龍虎門京華》在《新晚報》連載，反響不俗。次年，再由查良鏞寫作帶有「故鄉傳說」烙印的《書劍恩仇錄》，小說在《新晚報》連載後，一時洛陽紙貴，銷量倍增。一代武俠小說宗師「金庸」從此橫空出世。「鏞」字拆成兩半就是「金庸」，他自稱「沒有什麼含意的」。

► 1955年2月8日，《新晚報》刊登《書劍恩仇錄》首篇。



▲1951年5月8日，金庸以筆名「姚馥蘭」在《新晚報》開設「馥蘭影評」，開篇為《幾度山恩仇記》。



▲金庸的小說《雪山飛狐》。

「感謝《大公報》派我來香港」

對於自己一夜之間聲名大噪，金庸始終保持清醒平和的心態，謙稱自己是誤打誤撞、無心插柳，「成名完全是意料之外的事情。」但六十多年來，他所創作的《射鵰英雄傳》、《笑傲江湖》、《天龍八部》、《鹿鼎記》等代表作，已經成為華語文學經典，廣為流傳，經久不衰，鍛造了中國武俠文學史上難以逾越的一座高峰。

自一九四七年起，金庸在《大公報》（包括《新晚報》）前後工作十年，從上海到香港，從電訊翻譯到副刊編輯，幾乎跨越了整個青春時代。對於他來說，一九四八年來香港工作、一九五五年開始寫作新派武俠小說，這兩次人生的重大契機，都發生在《大公報》。

二〇〇九年四月下旬，金庸相隔五十二年應邀重回《大公報》。其間他參觀了編輯部，還即席揮毫寫下「評論自由 事實神聖」，並在下款誠摯標註「敬贈舊主人大公報」。回首往事時，金庸曾充滿感情地說：「我現在擁有的一切，雖有自己的辛勤努力，但更多是香港這一環境所賜。我要感謝《大公報》派我來香港！」



▲二〇〇九年，金庸重回大公報報館，題贈「評論自由 事實神聖」。

「新聞工作者訓練來自大公」

金庸始終認為，自己不是一個職業小說家，「真正擅長的是做報紙、做記者、做新聞。」而在《大公報》的工作經歷，無疑為他的新聞生涯奠定了堅實的基礎。

「《大公報》有一個傳統，在文字上很注意，一個字寫錯了，編輯就會來說，這個字以後不可以這樣寫。報社內部有很多規定，什麼字應該這樣寫，什麼字應該那樣寫，有很多規矩，對編輯的訓練相當嚴格。」金庸曾回憶道，「當年我在《大公報》學做翻譯，記得在翻譯美國一個部長訪問南京的談話時，翻譯老師指出我翻譯得太複雜，其實就是一句很簡單的話。他還耐心地告訴我怎麼翻譯比較好，怎麼就不好了，我至今還能記得。」

當時大公報社的籃球文化繁盛，上海《大公報》的籃球隊主力，曾代表中國參加1948

年的倫敦奧運會。受此氛圍影響，金庸也曾加入香港「大公籃球隊」，參加新聞、電影及出版「團結盃」賽。

金庸說，「我在《大公報》受到一個新聞工作者應有的訓練，並培養起一個報人的理想。」他所崇敬的新聞人，是英國《曼徹斯特衛報》總編輯斯科特（C.P.Scott）與《大公報》總編輯張季鸞，他們都以言論影響了時代與社會。而提攜、教導過他的幾位《大公報》前輩胡政之、楊歷樵、許君遠，亦令他一生懷念。



▲香港「大公籃球隊」人員合影，後排左二為金庸。

與黃永玉梁羽生惺惺相惜

沈從文曾說過，「大時代像個篩子，我們這幫青年就像沙子一樣篩來篩去。很多人從眼裏漏下去了，剩下粗大一些、耐磨的幾粒留在上面。」在那個精英輩出、「沙」以類聚的年代，金庸在《大公報》結識了不少值得紀念的故交。

黃永玉就是其中之一。半個多世紀前，他們曾在《大公報》同一間辦公室裏共事。有人評價說，「金庸是大俠，黃永玉是怪俠。」兩位中國現代文化史上的傳奇人物，就這樣走到了一起。

其間輾轉流離，兩人多年未見，直至上世紀80年代初才得以重逢。後來黃永玉經常在香港舉辦畫展，金庸常受邀出席。他曾撰寫《讀黃永玉的畫》一文道，「黃永玉最愛畫的就是這些角色，就是平民老百姓，即使曾經英雄過，但現在倒落落魄魄生活着的一些人。正因如此，黃永玉之畫的能量在香港是最接地氣的。」

當然，更為世人津津樂道的，是中國新派武俠小說史上鼎鼎有名的兩大宗師——金庸與梁羽生之間，綿延數十年的情誼。

兩人談得最多是武俠小說

1948年，查良鏞被調往《大公報》香港館。1949年7月，陳文統前往香港《大公報》應聘。主考官正是與他同齡的查良鏞，當時的他是《大公報》國際版的翻譯。「當時我覺得文統兄的英文合格，就錄取了。沒想到他的中文比英文好得多，他的中文好得可以做我老師。」查良鏞曾回憶道。

兩人在《大公報》工作時很快便嶄露頭角。相仿的年齡、相似的愛好，讓查、陳二人很快成為好朋友。

陳文統去世後，查良鏞曾在一篇悼文中

追憶當時情形：「這一段時間是我們兩人交往最多、關係最密切的時候。我們兩人談得最多的是武俠小說。那時文統兄每天下午往往去買二兩苕菜、四兩燒肉以助談興，一邊飲酒，一邊請我吃肉，興高采烈。」

「金庸」、「梁羽生」這兩個「如雷貫耳」的名字第一次橫空出世，都是在《大公報》的子報《新晚報》上。可以說，這裏既是金庸、梁羽生兩位先生相識相知的地方，更是引領他們從一介書生走向「武俠小說宗師」、並由此孕育出中國新派武俠小說的一大「福地」。

梁羽生移居澳洲後，每次回香港，金庸都做東請客，金庸去悉尼，梁羽生也會去看他。兩人每次見面，都會下幾盤棋。梁羽生老家廣西梧州市蒙山縣城的梁羽生公園，匾額也是金庸題的。

2009年1月，梁羽生在悉尼逝世，享年85歲。金庸託人送去了輓聯。聯云：

「悼梁羽生兄逝世
同行同事同年大先輩
亦狂亦俠亦文好朋友
自愧不如者：同年弟金庸敬挽」



▲查良鏞（金庸，右）與梁羽生（左）同樣愛好琴棋書畫，經常對弈。